

SFC研究所日本研究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ラボ

ワーキングペーパーシリーズ No. 7

#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安全保障研究への考察

—改革開放30年来の歴史と現状—

呉懐中\*

2013年6月

「新しい『日本研究』の理論と実践」

SFC研究所日本研究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ラボ

本稿は、拙稿「中国における日本安全保障研究への考察—改革開放 30 年来の歴史と現状—」(『当代中国の日本研究』(中国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1 月、70~90 頁)を大幅に加筆修正したものである。加筆に当たっては、2010~2012 年度に実施し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発展報告支援事業「中国社会科学院創造革新プロジェクト出版助成」による支援を受けた。記して感謝したい。

The Studies of Japanese security and defense in China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30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Huaizhong WU

Associate Professor, CASS,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准教授・政治研究室長 (wuhz@cass.org.cn)

#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安全保障研究への考察

## —改革開放30年来の歴史と現状—

呉懐中

### 概要：

本稿では、改革開放30年来の、中国における日本安全保障研究の歴史と現状を論考の対象とする。中日関係や中国の安全保障環境とだいたい関係があると思われるので、この分野への注目度は中国では常に高く推移してきたのである。30年来の研究実績には幾つもの特徴があると思われる。すなわち、研究の体系化・組織化や実学化・社会化、研究作品の量産化、研究段階性の顕在化（三つの大きな段階）等が挙げられる。しかし同時に、研究内容の偏在性や研究方法・アプローチの手遅れと単一化、また国際性や時代性の不足など足りない一面も挙げられる。本稿では、このような状況を時系列に沿って明らかにするとともに、いかなる姿勢によって客観的に日本の安全保障問題を見るべきかなどにいても考察・提言する。

### キーワード：

中国、日本、安全保障研究、歴史、現状

# 中国的日本安全防卫研究 30 年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吴懷中

30 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期和新局面，也带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繁荣与发展。日本问题研究始终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sup>①</sup>，30 年来，随着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和中日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学者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也步入了快速和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这当中也包括了对审视中国国家利益和周边外交环境来说非常重要的“日本安全防卫研究”。

日本安全防卫研究，从中国社科院学科划分的角度来说，属于二级学科“日本研究”下面的三级学科——“日本外交安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在日本所的学科体系规划中，它被确定为“日本外交研究室”的中近期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学科队伍与研究平台是所有学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本学科（以下，视必要简称为“学科”）在这方面的基本情况如下。

（1）学科队伍。因为是二级学科下的分支学科，又因为安全防卫问题在日本尤其以其“敏感性”而常常从属于政治外交事项，所以除了极少部分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军队科教单位）以外，全国拥有国际关系学科点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包括专业的日本研究机构）中，虽然多少都有学者涉及日本安全问题研究的（包括一般的国际政治学者），但却没有专攻日本安全防卫问题的研究人员。在日本研究领域，政治、外交、安全防卫三个分支学科是高度重合而无法加以严格区分的，这可以说是本学科的学科点分布和研究队伍情况的一大特点。

（2）研究平台。作为学科建设硬件指标的专业学会、资料积累、学术刊物、研讨会、国际交流等研究平台，还缺乏完整意义上的构建或布局。学会和期刊是重要的学术平台和沟通渠道之一，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成果和研究突破往往都是

---

① 唐家璇 2010 年 5 月在中华日本学会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联合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日本学刊》2010 年第 4 期。

② 在教育部学科体系划分中，一级学科政治学下面设有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这些学科拥有相同或相关的研究对象，在教研实践中很少明确加以区分，一般也被称为国际关系研究或国际问题研究。这些二级学科之下设有三级学科“区域政治和各国政治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安全防卫研究”也可以算是该三级学科下的分支学科。

通过这两个途径实现和公布的。相比于日本和欧美，中国基本上还没有独立的有关“广义安全保障”的学会、期刊和机制化的学术会议——这些一般都夹杂于国际政治和国别研究中的同类存在物中。

纵观 30 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安全防卫问题的研究，至少可以发现如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表现为成果内容宽泛、数量丰富、质量较高。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军事安全领域本身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并且对象还是容易引起关注的“日本话题”。从研究内容看，30 年来的相关研究几乎涉及日本安全领域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安全战略与政策、防务建设及军备动向、对外安全关系等各类议题，基本没有留下重大的领域空白。从总量上看，30 年来我国学者研究日本安全问题的文章作品还是为数不少的。如果将“修宪”、“入常”等问题也算入广义的安全议题，则在关于日本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其成果或许仅次于经济类文章的数量。据笔者初步估算，这些论文至少有 300 篇以上，登载的报刊种类则不下几十种。如果再算上年鉴类（《世界军事年鉴》和《日本发展报告蓝皮书》）中的相关文章以及多版《日本军事基本情况》等资料、非学术研究的报刊类文章、网络媒体上的各种评论，那就更是汗牛充栋，难以计数了。同时，研究成果具备一定深度，研究的理论性、思辨性和系统性逐渐加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开始进化，符合学术规范的成果增多，知识创新得以推进。以上三种趋向与时间的推移呈正相关关系，进入 21 世纪后这种关系则更为明显。

其次，研究的立场和视角鲜明而连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意识”强烈。本学科承载的主要课题，就是要研究和回答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保障密切相关的“日本安全防卫的发展状况和走向”。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30 年来，以涉及中国自身安全利益的问题意识为切入口和出发点，中国学者始终对日本军事安全领域的“大国化”和“普通化”以及作为其“外溢效应”的对华政策动向（包括日美同盟涉华部分）保持了较为连续而高度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从能力和意图两个方面，对包括军备及力量建设、战略及政策调整、体制和法制变化等在内的重要议题进行了众多的跟踪和分析。其成果从 1980 年到 2010 年每年都有问诸于世的，可以说基本没有间断过，数量较为庞大。

再次，如果将 30 年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及高潮。也就是，在世界形势或东亚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美关系面临重大

调整以及与此关联的日本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学术界对日本安全领域的研究往往会出现研究成果集中涌现的现象。其中，两个最显著的高峰期分别是 1990 年代后半期（1995—2000）和 21 世纪“9.11”事件发生后的小泉·安倍执政期间（2001—2007）。在这两个高峰期中，围绕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变动和调整——前者围绕日美同盟“再定义”进程、《防卫计划大纲》和“周边事态法”出台等问题，后者围绕自卫队海外派遣、“有事法制”相关法案、驻日美军整编和同盟再强化、防卫力量建设及体制整合等问题，中国学术界产出了为数众多的各种成果。同时，在这两个高峰期的两侧，分别还有三个左右的“次高峰期”，即关于 1980 年代后期的日本军事大国化问题、1992 年左右自卫队跨出国门问题、2008 年前后日本的太空及海洋政策出台等问题的研究。

日本安全防卫领域的动向，较之于其他的一般政治领域，与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因而，从非严格意义上来说，可以划出冷战前（1980 年代）、冷战后（大致是 19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初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这三个大的 10 年期，来作为划分日本安全防卫研究（学术）史的主要区间。这种划分，既体现了中国学者们各有重点的视角和观点，又从某种程度反映了日本安全领域本身演进的延续性和规律性。研究内容则既包括动态性分析，又不乏体系性研究。当然，如果再细分的话，每一个大的 10 年期又可以划分出若干各具特征的中小时段。以下，以三个十年为阶段划分，结合区间重点和特征，就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安全防卫进行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观和综述。

## 一 起步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

80 年代的总体研究特点是：（1）由于国门刚刚开放，对日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研究成果量少质弱，几乎没有关于日本安全防卫问题的厚重著述。（2）在 80 年代中前期（1980—1985）和中后期（1985—1989），由于国际形势、中日关系和日本安全防卫战略的变动，分别出现了从关心联日对苏、军工装备以及军事大国化等视角撰写的研究作品。（3）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世界军事年鉴》和《日本军事基本情况》开始发行，每期(册)载文介绍防务战略和政策、制度和体制、指挥和训练、装备和后勤等方面的动向。这些都是情况介绍性的短文，属于为即将到来的专业研究做铺垫的普及性读物，也说明我国的（军队）专业研究人员在

国门开放后已开始尽可能地全面关注日本的防卫建设。

### （一）80年代中前期的单纯关心

19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进入新冷战，中美关系向好，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并在联合对苏上形成某种默契。同时，学习日本和友好交流的热潮遍及中国，积极正面的日本观构成了中国社会对日认识的主流。由于这些背景因素，中国学者对日本的对苏防卫态势和动向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当然，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早期的8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还很缺乏研究日本安全防卫问题的正规学术论文<sup>①</sup>。

同时，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都有的一个现象，是在物质（器物）层面上对国外动向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关心。中国的日本研究学界也不例外（虽然并非这个时期的普遍现象），开始关注和跟踪日本军备和技术发展的某些前沿动向<sup>②</sup>。同时，也可以看出的是，这些准论文性质的文章还没有将“这些动向”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直接联系起来并显示出担心的论调，这一点与之后的80中后期是有所不同的。

### （二）80年代中后期的某种担心

这个时段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国学界对日本军备扩张、军费增加（1987年撤销防卫预算不超过1%的限制）和政策调整以及与此关联的军事大国化趋向表示了较强的关心。其背景原因是：日本进入1980年代后经济如日中天，开始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并以“西方一员”的立场谋求发挥和扩大军事安全作用。特别是在中曾根执政期间（1982—1987），日本调整“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增加防卫费用，加强军事力量，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性质和作用分担（包括放宽对美武器技术出口管制等），防卫战略显现突破“专守防卫”的“攻势化·大国化”倾向。这一政策变化和军事大国化倾向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频发（1985年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第二次教科书事件、1987年光华寮问题）等因素，这种关注甚至表现为

---

<sup>①</sup> 如下准学术文章均显示了这些倾向：丹东：《日本深感苏联的威胁》，（《世界知识》1979年第10期；王泰平：《苏联军事威胁下的日本防卫态势》，（《世界知识》1980年第2期；樊勇明：《苏联南下扩张攻势下的日本防卫动向》，（《国际问题资料》1981年第2期；加藤宽、蔡慧梅：《日本对苏联综合国力的评价》，（《苏联东欧研究》1983年第2期。

<sup>②</sup> 这些文章有：李淑春：《日本常规武器发展现状》，（《现代兵器》1984年第5期；金泰相：《战后日本的军事工业》，（《现代日本经济》1984年第6期等。

自中日签订友好条约（甚至是恢复邦交）以来中国首次出现的某种对日担心和戒备意识。在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从增加预算、政策调整和思想变动、装备和技术角、组织和体制等具体角度出发，分别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基础条件和发展倾向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和分析<sup>①</sup>。

## 二 提速发展与成型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

整个 90 年代，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安全防卫的研究，首先在成果数量上大大超出了此前的 80 年代，其次是出现了“一小一大”两次高潮期。在后者，“一小”是指针对 90 年代前期自卫队首次正式走出国门、日本军事力量开始发挥国际作用，中国学者表示了一定的关心；“一大”是指针对 90 年代中后期日本军事安全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动——日本防卫政策和力量、日美同盟关系、中日安全关系等的变化，中国学者以比较强烈的关心进行了跟踪、分析和批判，并发表了各级各类的研究成果。

### （一）对 90 年代初新形势的探讨（1990—1994）

这个时期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三个主要特点。

1. 作为冷战结束前后的过渡期，中国学者延续 80 年代后期的研究倾向，继续关注日本“大国防卫”战略的走向和物质基础（军工装备、军事经济等），尽管这些成果数量不多，有的还并非严谨的学术论文<sup>②</sup>。

2. 这一时期日本安全防卫领域的重大动向，是 1992 年日本制定“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简称“PKO”法），自卫队在战后首次走出国门发挥国际安全作用。

---

<sup>①</sup> 例如，军事科学院编著《日本军事基本情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就是这种意识的代表。此外，凌敏《日本防卫费连续六年突出增加》（《现代日本经济》1986 年第 12 期）、韩秋平《日本防卫费的突破与军事大国》（《日本学论坛》1987 年第 4 期）从预算增加的角度，温味几·王力争《日本军事战略发展趋势浅析》（《日本问题》1987 年第 6 期）、刘晓光《日本防卫新动向》（《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 年第 9 期）、刘晓光《评日本防卫厅“长官指示”》（《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 年第 3 期）、戈更夫《日本防务政策和防卫力量的发展变化》（《国际问题研究》1989 年第 1 期）、潘俊峰《日本军事思想史的考察》（《日本问题》1989 年第 6 期 / 第 8 期）从政策调整和思想变动的角度，刘晓光《日本扩军中的美国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 年第 9 期）从日美同盟因素的角度，分别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基础条件和发展倾向进行了论述和分析。

<sup>②</sup> 这些论文计有：杨伯江《日美关系的特征及其中近期走向》（《现代国际关系》1990 年第 2 期）、夏明琦《日本军事战略的发展趋势》（《外国问题研究》1990 年第 3 期）、钟锐《当今日本的军工生产状况》（《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 年第 11 期）、夏明琦《日本军事战略的发展趋势》（《外国问题研究》1990 年第 3 期）。

冷战结束后的这一阶段，日本防卫政策进入了摸索和过渡时期。为替防卫力量发展找到借口，与“日美欧三极论”的盛行相随，日本国内开始兴起了自卫队的“国际贡献论”——让自卫队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式做出“国际安全贡献”。当时的日本政府在1992年和1993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就前所未有的单设“国际贡献与自卫队”一章，来专门讨论自卫队的国际贡献问题，声称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日本理应履行的国际责任，可见日本政府当时是以极大的热情和能量来推进此事的。理所当然，中国学者将此动向作为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重大调整的风向标，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不乏一些重头文章，它们对自卫队走出国门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显示了某种担心<sup>①</sup>。

3. 在上述第2特点中，虽有一些冠以“战略”和“政策”研究的论文，但它们论述的基本都是日本防卫政策的外向化、自卫队走出国门等的单项事例，还算不上综合、长线和理论性的“战略”研究。不过，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是出现了初始的专著成果，即军事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潘俊峰主编的《日本军事思想研究》（1992年）。该书自古及今地综述了日本的军事安全思想，其中的“日本当代军事思想”一章，涵盖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主要的安全思想，如“吉田主义”、“自主防卫论”、日美同盟论、“综合安保战略”和“国际国家论与军事大国化”等，在学术史上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象征意义。

## （二）对90年代中后期（1995~2000）重要事态的关注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日本安全防卫问题上可以说取得了一次成果大发展的繁盛局面。也可以说，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学术界研究日本安全问题的基座开始真正扩容并初具规模。其背景因素是，经过90年代前期的摸索期和90年代中期（1994—1996年）的转折期后，冷战后日本安全防卫政策进入了90年代中后期转向和质变的阶段。其特点是，与冷战后世界安全形势的总体缓和趋势相反，日本从实现“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出发，开始重新审视“吉田主义”安全路线，进一步强化日美安全体制，加速军事转型和发展，构筑“能动的建设

---

<sup>①</sup> 例如有：池元吉《日本向何处去》（《东北亚论坛》1992年第3期）、朱明权《日本防务政策的一次重要的调整》（《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杨运忠《90年代日本防卫战略的重大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4期）、林晓光《日本防卫政策、军事战略的演变及其近年来的重大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9期）。其他类似的还有：周长明《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演变及国防军事的现状》（《自贡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杨运忠《论90年代日本防卫战略调整及其走向》（《国际观察》1993年第1期）、杜农一《略论日本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第8期）等论文。



性的安保政策”；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强调地区新“威胁”和“危机”的论调——这既为防卫政策转型提供依据，也为应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未来前景。因而，这个时期，中日两国开始在一系列安全议题上出现了认识分歧和互信磨损，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双方政治关系曾一度趋于建交后 20 多年的“最低点”。这些重要事态，当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切和研究兴趣，催生了相应的学术成果。从数量和形式上讲，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如下四大特点。

1. 研究成果的数量激增，大大超过了 90 年代中前期或整个 80 年代全期。这是因为 90 年代中后期日本安全政策大幅调整、“好戏”连台——以新《防卫计划大纲》、“日美联合宣言”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周边事态法”出台为标志，日本自主防卫战略、日美同盟和中日安全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尤其是“指针”和“事态法”等被认为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聚焦，形成了日本安全问题研究“成果量产”局面的首次来临。据初步统计，90 年代中后期的相关论文有 50 篇以上，迄今为止也只是仅次于 21 世纪初期阶段的成果数量

2. 开始出现较多的从理论和历史高度分析“战略”和“政策”的论文（数量当在 20 篇以上），而不只是像之前那样更多的在于分析某些零散的动向<sup>①</sup>。这些论文的公约数内容是：以冷战结束（部分涵盖二战后）尤其是 90 年代中后期日本自主防卫、日美安保体制和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演变为线索，就日本安全战略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调整趋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体考察和分析。

3. 还有一个特点是涉及对日本安全战略和政策进行“总结+前瞻”的著书（主要是其中的部分篇幅涵盖安全防卫领域）批次出现。在世纪之交（1997—2001）的重要时段，总结和前瞻日本政治（包括外交和安全）和中日关系的著述集中出

---

<sup>①</sup> 这些论文计有：陆俊元《从地缘政治看日本的安全战略》（《日本学刊》1995 年第 3 期）、王纯银《日本防卫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日本学论坛》1996 年第 2 期）、徐世刚等《90 年代日本的安全战略与亚太关系》（《外国问题研究》1997 年第 6 期）、石晓明《21 世纪日本防卫政策走向及防卫力量的发展趋势》（《东北亚论坛》1998 年第 2 期）、金熙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轨迹》（《日本研究》1998 年第 3 期）、赵大为《日本军事安全战略及其前瞻》（《国际问题研究》1999 年第 4 期）、姚文礼《论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兼析“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日本学刊》1999 年第 4 期）、陆国忠《世纪之交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00 年第 1 期）、殷燕军《日本新安全战略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南开学报》2000 年第 5 期）、周永生《日本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安全战略》（《北方论丛》2001 年第 3 期）、戚洪国·张跃东《后冷战时代的日本军事战略》（《日本学论坛》2001 年第 3 期）等。

现，也属题中应有之义。这些著书皆含日本安全防卫政策的独立章节<sup>①</sup>，着重揭示了日本在发展面临“坎坷”的前提下，其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却有着清晰的特点和趋向——以“政治大国”为目标诉求，推动自主防卫、强化日美同盟、开始介入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显现“防华、制华”倾向等。

(4) 该时期的一个“篇外”特点，是各种媒体开始广泛介入国际问题。随着 1993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各级各类媒体开始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多的篇幅来追踪国际时政并刊载相关文论——尤其是对诸如日本军事动向和中日安全关系这一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这一现象是之前时期所没有的，它给之后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双刃剑”：既带来了便利和宽松的信息条件，也形成了复杂而敏感的舆论环境。

从内容和对象上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四大研究板块。

#### 1. 关注以新《防卫计划大纲》为标志的政策调整

冷战后日本首份《防卫计划大纲》于 1995 年出台，相比于 1976 年的旧“大纲”，它宣称将沿用“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但更强调保持合理、精干、高效（而不单单是被动的）的可靠防卫力量、充实和加强日美安全体制，同时也发出了日美联合应对周边事态的讯息。

针对新大纲的出台，中国学者很快作出了回应。可以看到，当时发表的论文大致显露出如下几个关注点和判断：（1）日本渲染“威胁”，加强自主防卫力量建设，突破专守防卫方针；确定维持和强化日美安全体制，意图通过日美同盟体制发挥地区安全作用。因而，日本存在着成为“军事大国”、进而为走向“政治大国”造势的意图。（2）日本调整军事部署和防卫方向。新大纲使防卫态势“均衡化”，由重视对付“北方威胁”转为提高对“西南威胁”的警戒。再联系到从 90 年代中期起日本在其《防卫白皮书》中开始重点强调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实际是开始把军事斗争的重点转向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在新大纲中显示的上述两点指向对亚太和中国安全造成了不安因素<sup>②</sup>。

---

<sup>①</sup> 这些著作计有：孙承《日本与亚太一世纪之交的分析与展望》（1997）、张蕴岭编《合作还是对抗》（1997 年）、金熙德著《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1998 年）、阎学通等著《中国与亚太安全》（1999 年）、刘江永《彷徨的日本》（2000 年）、蒋立峰《21 世纪日本》（2000 年）、蒋立峰主编《21 世纪日本沉浮辩》（2000 年）、陆忠伟等主编《颠簸的日本》（2001 年）、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2001 年）、金熙德等主编《再生还是衰落》（2001 年）等。

<sup>②</sup> 这些论文计有：王纯银《日本防卫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日本学论坛》1996 年第 2 期）、郭真《试论经济大国日本的军事走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 年第 6 期）、黄永华《日本军事力量

## 2. 关于日美强化新型同盟关系

经过 1996 年“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和 1997 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签订，日美同盟基本完成了冷战后“再定义”的强化进程，其防卫范围和职能大大扩展。

中国学术界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关注，所发表的论文普遍涵盖了以下内容和意向：（1）“宣言”具有重大意义，是重新定义日本同盟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日美同盟从以保卫日本为主要目的双边合作转变为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安全机制、美日同盟关系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同时，“新指针”与 1978 年的旧“指针”相比，着重强调了日美在联手应对日本“周边事态”时的具体军事合作措施。日美正在扩大军事合作领域和范围，日本借机将防卫范围从远东扩大亚太周边地区，加大了对地区安全的介入力度。（3）以此为平台，特别是与美国对华政策协调配合，日本具有剑指中国并构筑安全包围体系的倾向，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需要引起中国的警惕。（4）以上各条反映出，日本意图背离“和平主义”和“专守防卫”原则，其防卫方针在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和转折，其军事大国化倾向值得关注<sup>①</sup>。

## 3. 关于“周边事态法”及对华安全关系

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一系列的安全防卫政策调整牵动着邻居中国的神经。经过新防卫大纲问世、日美同盟“再定义”，最后再到 1999 年“周边事态法”收官，这个时期，日本判断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可能发生的“周边有事”，因此通过制定“事态法”等措施加强相关应对能力。对此，中国学者则认为：日美

---

的崛起值得严重关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第 9 期）、徐世刚等《90 年代日本的安全战略与亚太关系》（《外国问题研究》1997 年第 6 期）、赵大为《日本军事安全战略及其前瞻》（《国际问题研究》1999 年第 4 期）等。

① 这些论文计有：杨运忠《美国政府进一步调整对日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 年第 7 期）、杨伯江《〈日美安保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现代国际关系》1996 年第 6 期）、李楠阁《日美安保体制再定位》（《外国问题研究》1996 年第 8 期）、张大林《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国际问题研究》1996 年第 10 期）、杨运忠《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第 11 期）、范跃江《日本：悄然崛起的军事大国》（《日本问题研究》1996 年第 11 期）、刘江永《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何以令人忧虑》（《现代国际关系》1997 年第 11 期）、殷燕军《日本对台湾海峡介入政策的变迁》（《日本学刊》1997 年第 6 期）、石晓明《21 世纪日本防卫政策走向及防卫力量的发展趋势》（《东北亚论坛》1998 年第 2 期）、周永生《冷战后的日本外交与日美安保体制》（《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 11 期）、朱昕昌等《90 年代日美关系的调整及其影响》（《日本学刊》1999 年第 3 期）、张碧清《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战争——关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亚非纵横》1999 年第 4 期）。

凭借事态法这一法律依据意欲联合介入地区冲突，为双方军事合作寻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为日本介入和主导地区安全事务提供借口；特别是日本对“周边事态”范围采取的模糊政策，实际上把台湾划入介入范围，将可能导致中日安全领域的激烈冲突，将深刻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也给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新的变数。

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现象，是认为 90 年代日本以调整后的安全防卫政策——“事态法”为顶点，对中国安全利益的染指达到了一个令人愤慨的程度。因此，学界几乎所有分析“事态法”的文章都难以掩饰不满情绪和纠弹论调，掀起了一次集体批判的高潮<sup>①</sup>。

#### 4. 对 90 年代的总体回顾和总结

如上所述，90 年代（尤其是中后期）以来日本的安全战略表现出相辅相成的几大动向：更新安全判断，渲染威胁时矛头指向中朝；强化日美同盟，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应对“周边事态”并染指中国安全利益；加大军事安全建设投入，提升自主防卫能力；调整防卫部署和军事态势，谋求“主动安全”并防范中国。因而，到了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诞生了多篇在对所有这些动向进行总结的文章，其共同中的见解为如下两条：（1）众多证据表明日本正在加速谋求成为军事大国，或者说正在谋取成为政治大国的军力基础和“禁区突破”，军事安全在日本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急速提升；（2）日本已将中国看作事实上的防卫对象以及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突出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和制约指向。这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将产生消极影响，也给亚太安全留下不安因素<sup>②</sup>。

---

<sup>①</sup> 这些文章计有：钱红《谁将是“东亚北约”对付的第一个“周边事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8 期）、姚文礼《论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兼析“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日本学刊》1999 年第 4 期）、王珏《制约 21 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1 期）、殷燕军《日本新安全战略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南开学报》2000 年第 5 期）等。

<sup>②</sup> 这些论文计有：董群《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浊流》（《清华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刘江永《美日重建安全体制与中美日关系》（《外交学院学报》1996 年第 4 期）、杨伯江《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初析》（《现代国际关系》1997 年第 7 期）、徐万胜《论战后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周永生《90 年代“安保体制”框架外的日本安全关系》（《国际论坛》1999 年第 4 期）、杨伯江《强化日美同盟——日本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起跳板》（《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第 6 期）、陆国忠《世纪之交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00 年第 1 期）、可辉《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政策与中日关系》（《太平洋学报》2000 年第 3 期）、孙健等《值得警惕的日本军事大国化倾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年 11 期）、冯晓峰《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强烈关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 年第 3 期）、周永生《日本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安全战略》（《北方论丛》2001 年第 3 期）等。

### 三 快速发展与初步繁盛阶段 21 世纪头 10 年

总体而言，经过前两个 10 年阶段的积累，借助“中盛日衰”和世界格局调整等国内外各种条件的激发，再加上研究手段的进步（资料公开加速、对外交流扩大、互联网普及、专门研讨会的频繁召开及其成果的公布）、研究人员的队伍壮大和素质提升（普遍掌握外语、留学人员增多、掌握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论）以及日本安全防卫领域若干重大变化的发生等因素，21 世纪头 10 年中国的日本安全防卫研究持续走热，基础不断夯实，它表现为：成果数量蔚为可观（超过了前 20 年的成果总和），整体水准提升（研究的内容、范畴和方法论不断拓展等），体系初步完善。作为知识体系的该学科终于露出了较为齐整的轮廓面目，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意义的变化。总结这 10 年间的日本安全防卫研究史，可以用纵向和横向两个坐标来进行。

#### （一）纵向：研究议题和内容的特点

##### 1. 对自民党时代“大国化·正常化·外向化”战略的关注

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9.11”事件后，日本界定其国家安全保障任务的两大目标是：防止和排除威胁直接危及日本、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使日本免遭威胁；提出的三项针对性防卫措施是：日本自身的努力、与同盟国合作、与国际社会合作。而在实际政策层面上，日本的这些防卫努力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以自主防卫能力的大幅提升和日美同盟的进一步强化为平台，以全新的“主动外向型”战略应对“新旧·多样化威胁”，同时积极发挥国际安全作用。

中国学术界在这个时期关心的是两大议题和目标：（1）日本国家军事机器恢复“正常功能”的进展情况（内向正常化）；（2）“松绑”的军事力量利用各种形式走出国门、发挥国际和地区安全作用的动向（外向正常化）。对这两方面合而为一的关注就是总体上表现为对日本“军事大国化”及其对中国安全有何影响的观察和分析。这种关注点在 90 年代业已部分存在，但当时的研究主客体条件和 21 世纪后出现的情况都是无法比拟的。

对此，中国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21 世纪以来，在自民党（联合）政权尤其是小泉和安倍等右翼保守势力主导下，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围绕自身努力、对美同盟、国际及地区合作等主轴展开，在安全领域的“普通国家化”及“国防正常化”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使日本朝着摆脱二战后传统安全路线进而成为“正常军事大

国”的方向上迈出了巨幅步伐；这 10 年间的“成就”，比起二战后到上世纪末 50 多年里的总和还要巨大。这一局面形成的背后被认为有以下三大要点。

(1) 关于提升“自身防卫能力”，推进“国防正常化”。

在这一议题上，中国学者对以下二大动向给予了重点关注和分析。

一是认为日本实现了防卫法制领域的历史性突破，取得了制定“反恐特别措施法”、“有事法制”诸法、“伊拉克复兴支援法”、“国民投票法”、“海洋基本法”、“太空基本法”、“海盗对策法”等成果。特别是 2003 年到 2004 年，日本通过“有事法制”相关法案，终于实现了拥有“战时动员法”的这一夙愿。中国学者对此抱有强烈关心和担心，撰写的 20 余篇学术论文几乎都认为，该事态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其目的旨在力图改变国家在军事动员方面受制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的局面，逐步确立国内战时体制和“先发制人”的指导理念，为成为军事大国扫除障碍。这些动向对中国的安全环境来说是令人担心的<sup>①</sup>。

二是对日本防卫体制整合和力量建设显示了很大的兴趣。首先是认识到日本在着手整合体制与编制，建立高效、集中的指挥与情报体系，提高自卫队联合作战能力。这起因于 2006 年日本设立了直属于防卫厅长官的情报本部和联合参谋本部，2007 年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同时对陆海空各自卫队的编制和体系结构进行大规模整改。其次是判断日本正开始建设“多功能、灵活而高效”的防卫力量。根据是日本通过两次“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正努力提高远程攻防和投放、反潜及信息战能力，建立独立的情报侦察体系，与美国一道构筑导弹防御体系等。所以，中国学者判断认为日本在防卫力量建设上取得了“远程化、大型化、尖端化”的长足进步，这是日本军事大国化的重要载体体现，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了消极影响和不安因素，值得高度关注。不过，中国学者虽然对以上日本两大领域

---

<sup>①</sup> 赵阶琦《试谈日本国会审议中的‘有事法制’》（《和平与发展》2002 年第 3 期）、马为民《日本军事安全战略令人忧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刘昌明《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演变：从法律的角度审视》（《山东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杨运忠《日本防卫政策面临重大转折》（《当代亚太》2003 年第 5 期）、刘天纯《日本军事大国法制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张进山《浅析日本‘有事法制’的背景及意图》（《日本学刊》2003 年第 4 期）、高洪《日本有事立法中的政治力学管窥》（《日本学刊》2003 年第 4 期）、吴心伯《日本与东北亚战区导弹防御》（《国际问题研究》2003 年第 5 期）、李章源《日本‘有事法制’制度的战略背景及其重点》（《国际论坛》2003 年第 5 期）、袁杨《日本军事转型与中日军事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10 期）、张森林《日本‘有事法制’议案和新版〈防卫白皮书〉评析》（《日本学论坛》2003 年第 4 期）、王希亮《评日本‘有事法制’的出台及其实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 期）、胡荣忠《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新动向》（《日本学刊》2004 年第 5 期）。

的动向表示了高度的关注，但因这些领域学术性不强而技术性强、媒体效应强，所以其大量的跟踪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不是由学术研究来体现的，而主要是有各种媒体完成的，成果形式也多是新闻报道和媒体评论<sup>①</sup>。学术界所做的主要是从新“防卫大纲”为切入点，对政策变化和力量建设做出学理上的分析<sup>②</sup>。

### (2) 关于进一步强化新世纪的全球日美同盟。

进入 21 世纪后，在强化日美同盟方面，日本推动了派遣自卫队配合美国反恐、驻日美军整编、日美导弹防御合作乃至日美同盟围绕“世界中的日美同盟”的“再再定义”和深化进程。中国研究界在上述这些动向的基础上，认为这标志着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推动的日美同盟强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双向”发展阶段，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正式踏上全球化路线图，其适用范围从此前的远东、亚太扩张到了全世界，日美将联手干预国际军事安全事务，日本希望借此发挥更大的国际和地区军事安全作用。再联系到 2005 年日美在其“2+2”会议中染指台湾问题这一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学者对在日美两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主导下的同盟强化动向表示了高度的关注，例如认为“它是日美安全体制自 1996 年发生部分质变后的又一次质变，它从当时失去明确战略目标的‘同盟漂流’走向了‘同盟重塑’及‘同盟定型’”，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进入“定型、定调、定向的新阶段”<sup>③</sup>。

### (3) 关于以“外向干预”战略介入国际安全事务。

日本自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提出地区安全战略，但取得实质突破则是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地区安全合作方面，日本参与了东北亚六方会谈和对东盟安全合作以及

---

① 如下媒体都有相关报道：《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环球时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瞭望周刊》、《当代世界》、《世界知识》、《现代军事》、《中国民兵》、《中国新闻周刊》、《国际展望》、《环球军事》、《兵器知识》、《舰船知识》、《国防科技》、《中国航天》、《舰载武器》、《当代海军》等。

② 这些论文有：江新风《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全面调整——评安保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报道》（《日本学刊》2004 年第 6 期）、胡继平《从新防卫大纲看日本安全战略的调整方向》（《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1 期）、王宏伟《新防卫大纲对日本军事工业发展的影响》（《国防科技工业》2005 年第 2 期）。

③ 参见陆忠伟《把脉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377 页）。另外，这些论文有：张春燕《美日安全关系的变化及走势》（《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9 期）、徐万胜《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当代亚太》2004 年第 4 期）、王传剑《美日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当代亚太》2005 年第 9 期）、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国际论坛》2005 年第 5 期）、刘江永《日美同盟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观察》2006 年第 1 期）、吴怀中《日美“再编”协商与日本安全战略调整》（《日本学刊》2006 年第 4 期）、曹筱阳《美日同盟面向 21 世纪的调整》（《当代亚太》2006 年第 9 期）、黄大慧《从“纸上的同盟”到“行动的同盟”》（《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5 期）、邵启哲等《解读日美同盟的新趋势及日本的战略意图》（《亚非纵横》2007 年第 2 期）、徐万胜《日美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军备扩张》（《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4 期）。

构筑日美澳印亚太安全网络。同时，以反恐和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为理由，日本还制定了“反恐特别措施法”、“支援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2007年修改“自卫队法”后，又将自卫队的“维持国际和平活动”由“附属任务”上升为“本职任务”。日本在放宽武器使用标准的同时将自卫队派到了印度洋、战时的伊拉克以及非洲索马里海域。

中国学者对这些动向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日本介入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是为了达到如下目的：（1）减低与他国之间发生误解和冲突的几率，预防地区不安并消除威胁因素；（2）利用多边机制牵制和抑制某些大国的扩张行为；（3）在日美安保之外外加一种安全选择和保险，增加战略回旋空间和地区影响力；（4）不管怎样，日本在推动上述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以及日美澳印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其中或多或少都暗含考虑“中国因素”、对中国实施牵制和围堵的意图<sup>①</sup>。

## 2. 对民主党安全政策取向的关注

民主党上台执政日浅，再加上政局动荡，其经过与现实磨合后的安全政策面目究竟如何，中国学界还处于观察和研判阶段。目前，还较少看到这方面的专业论文，但有关单位已召开过多次讨论日本政局的研讨会。透过一些分析民主党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文论，大致可知中国学者对民主党安全政策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1）在民主党上台初期（鸠山内阁），国内学者主要是探讨和观察其政策取向，并带有某种谨慎乐观的倾向，认为民主党的安全政策比自民党总体要缓和一些，有着如下一些指向：有所放缓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建设或军事大国化的步伐，特别是在修宪或“入常”等软件突破方面；谋求对美同盟关系相对平等的要求显著抬头但不会演变成“脱美”，趋势应该是走向亲美入亚或平衡中美；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政策有所调整，表现为主张以非军事手段、在联合国框架内发挥国

---

<sup>①</sup> 这些论文有：孙承《日本的地区合作思想与实践》（《日本学刊》2004年第2期）、王海滨《从日澳‘安保关系’透析日本安全战略新动向》（《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梁栋《战后日本军备发展过程中的朝鲜因素》（《日本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魏兰桂等《析“9.11”事件后日本防卫战略的调整与东北亚安全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孙健《日本防务政策调整及其对东亚安全与合作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段廷志《冷战后日本防卫战略：基本取向及其对西太平洋和中国海上安全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3期）、唐羽中《从〈日本的安全政策与东盟地区论坛〉看多边主义的困境》（《当代亚太》2008年第1期）、高峻《冷战期间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的起源与演变》（《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耿丽华《日本防卫政策及其对东亚的影响》（《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孙叶青《论欧盟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



际安全与维和作用，同时推动泛地区安全合作；此外，还初步显现了改善对华安全关系的意愿。

(2) 其后，针对菅直人内阁下的安全政策调整和新《防卫计划大纲》出台，较多的学者分析认为，由于内外种种原因，民主党政权在安保路线上是：一走老路、二有突破，正在回到此前自民党政权的“保守右倾”型老路上去，因为它既无法摆脱美国的安保束缚，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同中国的安全困境和结构矛盾，更遑论在实力和地位都下沉的情况下需要加速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因而，对民主党政权下乃至对后冷战时代以来日本的安全政策乃至对华方针的变化规律，中国仍需要进行连续观察和审慎研判<sup>①</sup>。

## (二) 横向：学术和学理的特点

这个时期学科的一个特点，是一部分学者脱离围绕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即事研究”的传统套路，开始积极开展基础性、理论性和全局性的研究工作。这说明，在研究队伍壮大、前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学科建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向更深和更广层次发展的高级阶段，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研究”的格局。在这个阶段，如下三类研究动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基础性专题研究深入发展

首先，对事关日本安全防卫的“物质基础”领域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细化。这种研究关注从 80 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90 年代进一步增长。21 世纪后由于资料、讯息和媒体的发达，对日本发展先进装备和军工的关注进一步增强，相关文章也有不同程度的出现<sup>②</sup>。其次，是从《防卫大纲》、《防卫白皮书》和各种咨询报告等官方文件的解读入手，以文本主义手法对日本安全政策演变的历史和轨迹进行分析。同时，对核武装、武器出口、专守防卫原则、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导弹防御等事关日本安全防卫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以找出关于日本安全战略的现

---

<sup>①</sup> 高洪《略论鸠山联合政府及其对华政策》（《日本研究》2009 年第 3 期）、刘江永《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国际观察》2009 年第 3 期）、刘江永《大选后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当代世界》2009 年第 10 期）、杨伯江《民主党新政与日本之变》（《外交评论》2009 年第 5 期）、周永生等《日本鸠山内阁的外交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1 期）、孙承《鸠山内阁外交的基本特征》（《日本学刊》2010 年第 2 期）、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理论分析》（《日本学刊》2010 年第 2 期）等。

<sup>②</sup> 这些论文有：张洲军《日本军事工业及其对战争支援潜力初探》（《东北亚论坛》2000 年第 1 期）、郭晨等《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模式浅析》（《军事经济研究》2006 年第 2 期）、范肇臻《日本国防工业金融支持模式透视》（《东北亚论坛》2009 年第 3 期）等。

状和走向（是否迈向军事大国、对地区及国际格局的影响）的可靠结论<sup>①</sup>。

理论性和全局性研究进展迅速

首先，理论性研究成果方面有一批显眼的文章面世。这些成果，从安全观、军事思想乃至战略文化这类涉及安全战略深层次的问题出发，对日本安全防卫进行了深入探讨。它们较之 90 年代后期呈现的相关论文，进一步融合了 21 世初期生成的新形势和方法论，显得视野更广，视距更长，立意更高<sup>②</sup>。

其次，全局性研究成果出现两个特点。第一，是成果时间上的跨度拉大，视线加长，具有纵向的历史长度，从战后一直研究到 2010 年<sup>③</sup>。第二，成果不仅是从中国或中日双边角度研究日本安全，而且从美日联盟中的美方角度，从中美日或中美日俄等大国关系角度，从更宽广的亚太·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区角度，来研究日本安全问题的论文（基本都是专著中的部分章节）开始出现。这些论文具有横向的、大视角下的多边角度和空间宽度，更加清晰地揭示了新世纪初期复杂多元的日本安全战略动向及其对外影响<sup>④</sup>。

---

① 金熙德《日本从“专守防卫”走向“海外派兵”》（《江南论坛》2002 年第 4 期）、吴怀中《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的演变和影响》（《日本学刊》2007 年 9 月）、吴怀中《从防卫白皮书看日本对华安全政策》（《东北亚论坛》2009 年第 1 期）、吴怀中《从〈防卫白皮书〉看日本防卫政策》（《日本学刊》2008 年 9 月）、徐万胜《论“集体自卫权”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国际论坛》2004 年第 5 期）、李秀石《行使‘集团自卫权’与日本防卫转向》（《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6 期）、贾丹《2007 年版〈防卫白皮书〉浅析》（《太平洋学报》2008 年 1 月）、崔志楠《日本谋求“集体自卫权”的动向、动因即影响》（《和平与发展》2009 年第 4 期）、黄大慧《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1 期）、吴寄南《日本“新国防族”的崛起及其影响》（《日本学刊》2003 年 9 月）、孙辉·林晓光《日本政界的新“国防族”》（《和平与发展》2007 年第 3 期）。

② 吕川《日本传统文化与军事观念》（《日本学刊》2004 年第 5 期）、李建民《冷战结束后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路径分析》（《国际论坛》2005 年第 3 期）、吕川《冷战后日本军事战略思维的基本规律探析》（《日本学刊》2006 年第 3 期）、仲秋·张玉国《战后日本安全观的延续与发展》（《日本学论坛》2008 年第 4 期）、刘强《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基于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的视角》（《国际观察》2009 年第 5 期）。以及如下著作中的相关论文：丛鹏主编《大国安全观比较》（2004 年）、朱宁《胜算——中日地缘战略与东亚重组》（2007 年）、朱峰《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2007 年）。

③ 这些论文计有：金熙德《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日本学刊》2002 年 3 月）、汪晓凤等《日本战后防卫政策的演变及走势》（《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 5 月）、杨运忠《日本加速向军事大国迈进》（《当代亚太》2002 年 5 月）、贾丹《21 世纪日本防卫和安全战略调整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03 年第 2 期）、姚文礼《21 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日本学刊》2003 年 11 月）、吴怀中《新世纪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亚非纵横》2007 年 9 月）、李飞《日本防卫战略发展动向浅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 2 月）、江新风·尤文虎《近年日本军事转型探析》（《日本学刊》2009 年 1 月）。另有著作中的论文：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2008）、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2005）、包霞琴等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2004 年）、金熙德《21 世纪初的日本政治与外交》（2006 年）、刘江永《中国与日本》（2007 年）等著作中的相关章节。

④ 含有这些论文的著作有：张蕴岭编《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2001 年）、刘建飞·林晓

专著放量问世，整体水准提升。

首先，有一些专门系统地论述日本安全防卫问题的专著出现（此前一般都是以有关著作中的某一章节的形式出现），如肖伟著《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研究》（2000年）、王少普·吴寄南合著《战后日本防卫研究》（2003年）、姚文礼著《日本安全政策研究》（2004）、孙成岗著《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2005年），是首批综合研究现当代日本安全防卫的专著，刘艳《冷战后的日美同盟解读》（2008年）、尚书《美日同盟关系走向》（2008年）、徐万胜等著《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周边安全》（2009年）等则是从日美同盟这一政策基轴的角度来研究日本安全防卫问题的。这些成果的出现，使得日本安全研究的层级进一步厚实、台基进一步牢固、学科体系进一步成型。

其次，还有一些成果是作为专著的有机部分，以独立章节的形式出现的成果。这类成果较多，例如在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编辑出版的年度《日本发展报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各年版中的章节都有反映。而且，不限于以往的日本研究书籍，国际政治、世界军事研究类的著述中也有部分出现的<sup>①</sup>。可以说，此类成果的出现进一步丰富、深化和扩展了学科构建的基础和内容。

## 总 结

以上是我国学术界 30 年来对日本安全问题研究的足迹和成果。可以看到，这些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特点：（1）学科队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纵向是老中青三代结合局面，横向是知识结构趋向合理和高阶。同时，研究平台进一步形成，包括资料、学会、杂志和出版条件的改善，为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前提。（2）研究成果的涵盖范围广泛

---

光著《21 世纪初期的中美日战略关系》（2002 年）、黄光耀《解读美日一战后美日关系发展研究》（2003 年）、刘世龙《美日关系》（2004 年）、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2004 年）孙承编《日本与东亚》（2005 年）、沈海涛等著《日本国家战略与东北亚外交》（2006 年）、乔林生《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2006 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亚太战略场》（2002 年）以及《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与安全合作构想》（2006 年）、阎学通等主编《东亚和平与安全》（2006 年）、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2006 年）、王伟民《联盟理论》（2007 年）。

<sup>①</sup> 同以上两注的部分成果。

而多元。从现有的几百篇论文和十多部著作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日本安全防卫研究的主要方面，基本没有留下重大的领域空白。(3)研究成果具备一定深度，理论性、思辨性和体系性开始加强，方法论逐步进化，符合学术规范成果增多。可以认为，这些成就为日本安全防卫研究进入快车道和加速腾飞提供了初步的基础条件。

当然，在概览并肯定这一历史成绩的同时，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和应该加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1. 研究内容上仍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一是具有体系性、全局性和理论性的厚重研究为数不是很多，二是扎实精细的基础研究及个案考察所占的比重也不大。既有历史追踪又有现状考察的大部长篇作品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空白状态，内容(包括选题、材料及观点)大量重复和雷同的现象比较明显(特别是针对热点事件和焦点问题)，使用日方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考察其安全思想、战略、政策、法制、体制和编制、力量和态势、战略前景和走向等的原创和独创性成果仍然显得很少。因而，历来日本安全防卫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在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和中日关系的著述中作为篇章的一部分被涉及和组稿的，直到进入 21 世纪后，一些日本安全问题研究专著得以出版和问世后，这种状况才得到一定的改观。

2. 研究的方法、手段和路径，仍需要改进、创新和提升。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以及国别研究学术环境的局限，“大而全”和“泛而空”的介绍、评述和概论性文章在日本外交安全研究领域占了很大比例，以问题为导向、具有科学论证、深度分析和理论创新的成果数量不多。特别是结合中外知识经验建立起理论范式和分析模型、提炼出一般性的内在规律、提供新的关于日本研究外交安全框架的论文数目明显不足。这也是中国学者的相关著述难以产生国际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在选题和学术站位上存在一些偏颇的取向，需要坚守作为学者的客观理性态度。学界对于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日本安全动向和政策调整比较敏感，跟踪也较及时，但对有些看似关系不完全十分密切的其他领域和部分，乃至全局把握、总体研究和基础整理等工作，则深入得不够充分。从中国近代开始，日本军事安全问题历来是国人关心的热点和焦点，特殊的对日感情往往夹杂其中，每有风吹草动，各种文章和评论铺天盖地——有的就是靠二手乃至三手材料拼凑而成的，

而当今现代媒体的发达又直接助长了这一现象。如果对日本政治、法制和文化与安全防卫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缺乏深入的研究，那就难以有效地去判别重大而紧要的现实问题。同时，国内各股研究日本的力量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分工，重复跟“风”追“热”，对问题的研究不深不透。所以，中国学者不能跟风走，要以正确的选题意识、专业立场和深入研究提供准确无误的学术成果。

4. 在时代特征以及学科发展方向的把握上，需要与时俱进，紧盯前沿，开拓进取。首先，研究内容需要深化。国际安全议题和议程都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安全内涵不断扩大，从传统安全问题到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呈现地区合作和全球治理加快的重大趋势。在中日安全关系中，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而且非传统部分将成为日常形态，所占的分量将越来越重，处理不好也会直接影响两国的政治大关系。其次，研究视角需要拓宽。当前，仅从一国或双边视角已无法把握日本外交安全问题的特征和全貌，这就需要以全球和多边的视野对日本的外交安全行为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分析。以上这两点既是难点和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也更应当被作为日本外交安全研究中新的知识增长点和创新点。中国学者在面对这一新形势时，在知识结构、分析手法和眼界视野上，面临着自我提升、跟上形势的艰巨任务。

5. 在建设性地开展建言献策方面，意识不够，能力不足，影响不大。军事安全问题对一国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利益性，中国学者应超越对官方现有政策仅仅进行阐释和解说功能，加强应用课题研究和政策调研，积极发挥咨询作用。为此，首先要改进前瞻性研究，培养战略眼光，注意规律研判。举例来说，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就有不少关注和批评日本“军事大国化”的论文，但几十年过去了，对于这一问题却依然缺乏总体的研判和清晰的界定。其次，中国学者不仅要具有批评意识，也要有把握时代脉搏、解决问题的积极意识，提出改善中日安全关系、创设周边安全环境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面临共同挑战。军事安全已经不仅是一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议题，有时也可转变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的跨国性非传统问题，也需要中日联合采取综合多元的手段加以应对。然而，针对有关中日在地区或国际安全议题上的合作事宜，中国学界似乎还没有给出足够有效的政策建议，还未能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强大给力的理论支撑。